

刘颖南 主编

文化市场

与

艺术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主 编:** 刘颖南

**副主编:** 于宝堂 张耀基

**编 委:** 薛若琳 苗 祥 黎 舟 于宝堂

乔建中 姜维康 王 镛 常 丰 戚

刘颖南 张海玲 伍国栋 张耀基

奚治茹

# 学习邓小平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指导繁荣我国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的崭新实践

(代序)

刘忠德

江泽民同志说：“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之所以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派日趋繁荣的景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领导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日臻成熟的理论思维，其完整的体现就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现在又写上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与发展，有力地保证着我们的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思想理论都是一个认识过程，因而也都是矛盾运动的过程。所以，毛泽东同志明确告诉

我们：“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性的，系统的，极富独创性的思想认识，其形成和发展必然有其鲜明的特征。对此，马克思曾经精辟地说过：“困难只是对这些矛盾作一般性的表述，一旦它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这种特质判断的方法，我们只有在认真学习，通读原著的基础上，充分研究，认识并把握这一文艺理论的存在特征，才能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才能正确运用这一文艺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不断实现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面临的根本目标。



理论往往是时代的产物，不平凡的时代造就不平凡的理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列宁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拨乱反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其整体理论大厦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一个显著的理论特征就是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

时代是依据某种特征划分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主流是决定时代特征的基本因素。文艺作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特殊样式的能动的审美反映，必然要围绕着时代的中心，运用自身的特殊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这是一条被文艺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

国当代的文艺工作也同样概莫能外。

十年动乱之中,阶级斗争被人为地推向了极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当时的时代中心的情况下,文艺工作不可避免地围绕着这种时代中心畸形运转,最终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那片浓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迷雾中,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濒于崩溃的边缘,使得文艺自身的发展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只能导致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萧条局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果断地实现拨乱反正,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时代标志,从此开始了一个坚决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时代,在促进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汇入了一江生机勃勃,滚滚东流的明媚春水。

紧紧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发展文艺,繁荣文艺,既是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因为经济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同样是包括文化艺术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顺利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的全面发展,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才能获得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对此,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针见血地阐述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证。”为了强调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凝重地阐明:“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

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同年10月,他对我国的文艺工作者再次强调说:“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

经过一场十年动乱,包括文艺事业在内的我国各项事业都面临着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情况,尽管邓小平同志已经关照到:“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失调,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并且下决心“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但是,邓小平同志在宏观指导包括文艺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尽可能综合平衡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要思想,语重心长地叮咛我们:“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十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他面对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们:“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

保持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我国各项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文艺事业不断繁荣的重要条件,因此,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做到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十多年来的时代进程充分表明,不管遇到什么复杂情况,甚至险峰恶浪,邓小平同志总是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深邃目光,牢牢盯住经济建设这个时代中心,并且扭住不放。他深刻地剖析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即使在我国出现了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既不忽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阶级斗争,又仍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精神毫不动摇地指出,

“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他在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那篇谈话中，明确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就是：“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苏联，东欧发生解体和剧变时，邓小平同志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非凡胆识，冷静而深刻地指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不顾年迈高龄，风尘仆仆地巡视南方，沿途考察的结果，更加证明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性，所以，他再次鲜明地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从历史的高度，精辟地总结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实施正确领导的实践中，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旨，把对现代化建设有利还是有害，作为检验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党的十四大报告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特别明确地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样，就对包括文化艺术工作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建设，如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时代中心进行全面发展这一重要的时代命题，做出了科学化、具体化、充满着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文艺理论的核心内容。“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这两句出自清代诗人赵翼的诗文凝练地道出了文艺的兴衰是与时代的命运密切相联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之初就作出的这个划时代的科学预言，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使经济建设这个时代中心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充满豪情地向我们宣告：“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种形势的出现已为期不远”，“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来说，实质上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崭新实践所必须围绕的经济建设这个时代的中心，正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

## 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既是产生理论的认识基础，又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报告会上深刻地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立足的基础是党和人民的崭新实践，它的光辉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在我们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概括的那样，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是伴随着我国文艺工作的实践，特别是在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如果我们将这一理论溶进一定的历史范畴中进行回顾、学习和研究，就不难看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其整体理论大厦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



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显著的理论特征就是洋溢着鲜明的实践精神。

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在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气概，千方百计地纠正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极左思潮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局面。他十分关注被“四人帮”极左路线搞得灾难深重的文艺事业。针对“四人帮”推行的一整套极左的文艺政策，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文艺政策要调整”；针对“四人帮”造成的“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一花独放的不正常现象，他挺身而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支持并帮助文艺工作者把电影《海霞》和《创业》的有关情况及时反映给毛泽东同志，使“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的极左路线受到有力抵制。

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展拨乱反正的斗争，大胆地冲破“左”的牢笼的长期禁锢。对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思想，他尖锐地指出：“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给予坚定的支持。他满腔热忱地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从根本上阐述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迳。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强劲新风，不仅使原本沉闷僵化的思想理论战线豁然开朗，并且如同春风化雨，使大旱之望云霓的文艺百花园生机盎然，一片新绿，出现了大解放、大发展的崭新局面。面对这种令人欣喜

的情况，邓小平同志热情地赞扬说：“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

1978年以后，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代表的右的倾向逐渐萌发，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和危害，提醒全党注意：“现在一方面党内有部分同志还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攻击中央新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和反对四项原则的思潮。”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党和人民继续肃清“左”的影响的同时，展开了反对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为基本特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他在后来同陈鼓应教授谈到当时情况时说：“中国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

1980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了蔓延的趋势，邓小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专门找宣传部门的同志谈了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他就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某个青年诗人到北师大的演讲以及乌鲁木齐文联筹备组召集人的发言等一系列散

布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明确地指出：“像这类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强调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时，在肯定“文艺界的成就是主要的”前提下，指出：“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在这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当时我国文艺工作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尖锐地批评了文艺界出现的脱离时代，歪曲历史与现实，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宣扬“表现自我”、“抽象人性”、“异化现象”，色情以及“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他严肃地提醒全党同志警觉：“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1985年以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党正确地解决了几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正确地处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与此同时，也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不断拨正了我们文艺工作的方向，指导我们文艺工作沿着正确的途径，不断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全面繁荣的崭新实践。邓小平同志始终认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了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他在总结同各种错误作斗争的曲曲折折的复杂进程时，实事求是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

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有‘左’的东西。”他进一步阐明“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危害时说：“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的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综上所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以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丰富的实践内涵，对我们文化艺术工作在各种纷纭复杂的情况下始终把握正确的航向做出了这样的启迪：一是要实事求是地清醒估计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对文艺工作的影响，力求将各种错误倾向消除在萌芽状态；二是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三是实事求是地把握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绝不能“一手硬，一手软”，两手都要硬。这些得来不易的深刻启迪充分昭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必须遵循的这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精神的核心体现。

### 三

作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历来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和运用的科学指南，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在对待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在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的同时，还特别着重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其理论大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个显著的理论特征，就是洋溢着鲜明**

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继承精神。

### 1. 关于文艺工作的方向

我们的文艺工作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风云变幻的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历来十分强调把握正确的方向，这是我们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一贯的优良传统，也是促进文艺事业沿着正确道路繁荣发展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大计。

对于文艺工作来说，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因而也就是一个必须弄清的方向性问题。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立场上对于这个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做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他认为，文学艺术“不是替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在我国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实践和文艺规律的结合上，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同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这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解决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际存在的许多复杂问题，不仅成为过去解放区文艺运动取得丰硕成果的保证，也成为后来开拓社会主义文艺广阔道路的指南。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同志坚定地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这一方向性论断，他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判断，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扩展为“为人民服务”；他还根据我国社会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将文艺工作一度出现的“为阶级斗争服务”改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的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涵。

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奔向富裕幸福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因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就是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服务。在新形势下，我们的文艺工作必须自觉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才是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坚持“二为”方向的根本点。

## 2. 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

1951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又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要“百家争鸣”，1956年明确提出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双百”方针做了更加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方针。”他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一个月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发展给了新的保证”。但非常遗憾的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在遭受了一连串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后，致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重大文艺方针，在“文革”结束前将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很好实行。

邓小平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反对割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整体系，主张在文艺工作中全面准确地实行“双百”方

针，1975年，他针对“四人帮”包藏祸心的形而上学，毫不含糊地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促进我国文艺事业走向繁荣所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时，特别强调说：“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因此，他在指导我国文艺工作的实践中明确指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对“双百”方针做了全面阐释，他在谈到百花齐放时说，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谈到百家争鸣时，他又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还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双百”方针的内容，他主张不要把“双百”方针看成是思想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应该看做是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相互交流，吸收，共同发展的手段。他一方面强调，“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和曲解”。另一方面，他还特别提醒“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事业之所以能够出现不断兴旺发达的格局，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正确地贯彻“双百”方针就是基本原因之一。

### 3. 关于文艺工作的源泉

什么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始终是各种文艺观争论的基本问题。马克思论述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的来源只能是社会生活。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运用于中国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对于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源泉这个文艺观的基本问题，同样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他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做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的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产物。”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他进而要求“革命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在我们党顺利地完成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主潮。“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面对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建设四化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同志从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这个中心出发，教育文艺工作者正确把握文艺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深刻理解文艺作品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在文艺家头脑中的能动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对于文艺家深入生活而取得的成就，他予以积极的肯定，说：“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对于一些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出现一些消极的作品，他予以深刻的批评说：“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启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从而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总之，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以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多方面的继承和丰富，应该使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实现这一方向和目标的基本方针和必由之路，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我国当代文艺工作者不可须臾脱离的时代源泉，越来越多的文艺家们积极深入到这一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去，才能开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宽畅大道。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脉络特点来看，这种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实践中坚持，在发展中丰富的科学态度正是其辩证的继承精神的深刻体现。

#### 四

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论述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辩证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时，还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艺工作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新开拓，逐步形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整套新建树。如果我们对这些新建树进